书而思

在书中领悟世界本质

□程志波 陶 春

恩格斯说：“自然科学本身就是彻底革命的。”自然科学不仅为人类争取自己的生存权利而斗争，而且不断刷新人类对世界的认知图景。

人类生存在宇宙之中，宇宙的图像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去往何处？流年易逝，但时间的本质是什么？人类能在时空中旅行吗？从古至今这些问题备受关注但众说纷纭。然而，一位身居轮椅但心游宇宙的物理学家的论著引起世界关注，这就是英国物理学家霍金的《时间简史》。对宇宙的认识，对时间的理解，直接影响着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该书中，霍金应用当时最新物理学与宇宙学知识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引人入胜的解释。

霍金解释说，现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表明，太阳是银河系的一千亿个恒星之一，银河系是局部集团中的许多星系之一，局部集团是宇宙中最大已知结构的几千个集团和星系团之一。但宇宙并非亘古如此，1929年美国物理学家哈勃的伟大发现表明，宇宙并非静止地存在着，宇宙亦有自己的生命历程。我们的宇宙始于150亿年前的一次奇点大爆炸。大爆炸时的奇点具有无限密度、无限热度和最大曲率；在大爆炸后的1秒钟，温度降低到100亿度，产生了光子、电子和中微子及其反粒子；在大爆炸后的100秒，温度降到10亿度，开始产生氘核、氦核和氢核等少量其他元素；在大爆炸后的几小时内，造核运动停止，最后温度降低到几千度，在电磁吸引力作用下原子开始形成；随着宇宙继续膨胀变冷，在引力作用下逐渐形成了碟状的旋转星系和椭圆星系，星系中的氢和氦气体又被分割成更小的星云。星云在自身引力作用下坍缩并开启热聚变反应，反应产生的热量以热和光的形式辐射出来，这就形成了恒星，但质量巨大的恒星会在较短时间将氢耗光，其中心区域会坍缩成致密的中子星或黑洞。始于大爆炸奇点，终于大挤压奇点，这就是宇宙的命运。奇点之前的宇宙是什么？霍金解释说，因为在奇点处所有物理定律都失效，所以不能预言从奇点出来什么以及先于奇点的任何事件，宇宙是有界无限的。但宇宙为何如此呢？一种解释就是人择原理，即人类看到的宇宙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智慧生命只能在宇宙的有限区域存在。霍金还特别关注了时间的本质问题。他解释说，根据相对论不仅没有唯一的绝对时间，而且每个人都有其自身时间测度，这依赖于其所处位置和运动状态。不但如此，在广义相对论中，空间和时间变成为了动力量，它们不仅影响而且被发生在宇宙中的每一件事所影响，这意味着可以通过对物体所处位置或运动状态的改变来改变物体所处的时空结构，或者说进行时间旅行。

如果说霍金的《时间简史》一书清晰地描述了宇观和微观世界图景，那么普利高津和斯唐热的《从混沌到有序》一书则再次开启对以人类自身为尺度的宏观世界图景的探索，在被霍金宣布终结了的理论物理学上打开了一个口子。这直接影响着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对社会的认识。

作者认为，经典科学主要关心稳定的周期行为，给出了一幅静态的、简单的、可逆的、确定性的、永恒不变的自然图景，形成了一种关于存在的机械自然观，但事实上，现实世界是一幅动态的、复杂的、不可逆的、随机性的、千变万化的自然图景，形成的是一种关于演化的自然观。这种对立涉及时间是否可逆、自然界演化方向是从混沌到有序还是相反、自然界的发展是确定的还是随机的等根本问题。自然界不仅有稳定、有序、均匀、平衡和线性的一方面，也有不稳定、无序、多样、不平衡、非线性的一方面，熵不仅向着无序滑去，也会成为有序的根源，即有序可以从无序中自发地产生出来，但这需要条件，这种条件就是系统处于远离平衡态的分叉点。自然界是由无数子系统构成的复杂巨系统，系统内部的子系统不断起伏涨落，当涨落由于正反馈而变大以致将要破坏原有系统时，分叉点就出现了。在这一时刻，系统的变化方向充满不确定性，它可能滑落到混沌状态，也可能跃进到更高有序状态，形成耗散结构。具有耗散结构的系统除包含有简单吸引子外，还包含有混沌吸引子，后者隐含着系统的随机行为。系统的内在随机性隐含于系统的内在不可逆性之中，而不可逆性存在的原因在于熵垒的存在。

无论是霍金的《时间简史》还是普利高津与斯唐热的《从混沌到有序》，关注的都是物质世界。舍恩伯格的《大数据时代》一书则关注了世界的另一面：数字世界。把人引入信息化、数据化的新范式中。

舍恩伯格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很多令人振奋的观点。他以新的方式再次使人想起古希腊先哲的观点：数乃世界之本源。他认为，随着计算机与数据收集与处理技术的发展，人们可以收集和处理超以往的“大数据”，而这将根本性地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与思维方式。大数据中的“大”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大，而是指不用随机分析的方法，而采用所有数据的方法。大数据的精髓在于信息分析时的三个转变：一是从依赖于随机采样转向获取和处理与现象相关的所有数据；二是不再沉迷于追求精确度，只要掌握大体发展方向即可；三是不再紧盯事物间的因果关系，而更关注寻找事物间的相关关系，让数据自己发声。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成为价值不菲的公司资产、重要的经济投入和新型商业模式的基石，一场发掘和利用数据价值的竞赛正在全球上演，而人们对于数据的看法以及对于由因果关系向相关关系转化时释放出的潜在价值的态度，是主宰这场竞争游戏的关键。大数据的发展动力来源于人类测量、记录和分析世界的渴望，这意味着人类的弱点和优点便与大数据相伴而生，但在大数据时代，对每个主体而言最危险的不再是隐私泄露，而是被预知的可能性。

科学是如此之重要，它是怎样被创造出来的？当代科学知识生产有何新特征？齐曼的《真科学》、吉本斯的《知识生产的新模式》和李正风的《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给出了富有启发的解答。

齐曼指出，现代科学活动方式正发生学院科学让位于后学院科学的根本变革。学院科学遵从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独创性和有组织的怀疑（简称UCDOS）规范，但后学院科学（或产业科学）不适用于“UCDOS”规范而适用于“PLACE”规范，即所有者的（Proprietary）、局部的（Local）、权威的（Authoritarian）、定向的（Commissioned）和专门的（Expert）。后学院科学产生不一定公开的所有者知识，它集中在局部技术问题上而非总体认识上，研究者在权威下做事而非为个体做事，他们的研究被定向要求达到实际目标而非追求知识，他们作为专门的解决问题人员被聘用而非因为他们个人的创造力。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发生这种根本性变化的原因在于科学活动社会语境的变化，吉本斯将这种变化看作是：作为一种知识生产方式的科学由模式1向模式2的转化。模式1以探索基本原理为目的，而且基础与应用之间的界限不明显，模式2则是应用语境下的、跨学科域的、知识生产的多场域化、高度自反性、重视质量控制的，它发生于商业化、高等教育高度发展、人文科学角色发生变化、全球化、组织化重组以及注重管理等语境下。李正风恰当地将当代科学知识生产的新特征概括为学术语境与应用语境并重、学科研究与超学科研究并重、同质性互动与异质性互动并重、学术使命与社会责任并重、稳定单一与敏捷多样并存等。

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和感悟

——领导干部主题征文启事

中共中央党校是培训轮训党的高中级领导干部和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的最高学府。每年，大批在职高中级领导干部以学员身份汇聚于此学习提高，这是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要举措，关乎党和国家的长远大计。

许多领导干部通过在中央党校学习，增强了使命感紧迫感，强化了问题意识，加强了党性修养，把握了基本理论，开拓了世界眼光，提升了能力素质。为了进一步推动学习型政党建设，引领广大党员干部更好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适应新常态、提高新本领，《学习时报》特举办“我在中央党校的学习和感悟”主题征文活动。本次活动主要面向正在或曾在中央党校学习的领导干部，欢迎大家踊跃参与。

具体事项如下：

体裁字数：议论文叙述文等文体均可，一般不超过6000字。

内容要求：1.作品必须为作者真实的体会和收获；

2.来稿请注明作者的工作单位及联系方式。

征稿时间：见报即日起至2015年3月31日止（以邮戳为准）。

征文评选：征文截稿后，本报将评出一等奖5名，二等奖10名，三等奖20名。获奖文章将在《学习时报》及中央党校报刊社其他媒体选登。优秀文章还将结集出版，相关图书向全国副省级以上党校等单位赠送。本次征文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

投稿方式：

1.征文请邮寄至：北京市海淀区中央党校南院报刊社

邮政编码：100091

2.通过邮件发送至：xuexishibao99@163.com

联系人（收件人）：李少军

联系电话：010—62806049

好书推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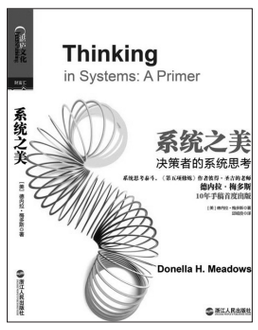
书名：《系统之美：决策者的系统思考》

作者：[美]德内拉·梅多斯/著 邱昭良/译

出版：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8月

推荐人：宋铠 美国凯斯西储大学系统工程博士、组织学习专家

推荐语：今天人类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工业时代根深蒂固的心智模式以及由此主导的教育体制——把活的系统当成机器，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拆解和还原的，可以用理性和逻辑去预测和控制。然而，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周围充满了各种活的系统，不仅需要逻辑分析，也离不开艺术、直觉、爱与慈悲等智慧。我们必须注重心与物的平衡、左脑和右脑的平衡，冷静洞悉系统的动态性、整体性和规律性。如果能把这种根植于东方智慧的全脑思维技能推广普及，对于社会的和谐、个人的发展，都是价值无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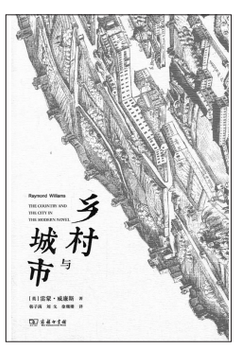


书名：《乡村与城市》

作者：[英] 雷蒙·威廉斯/著 韩子满 刘戈 徐珊珊/译

出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6月

编者谈书：本书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种种论断和描述，对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中一些错误的乡村观念和城市观念进行了剖析，指出其谬误。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显示出昔日的英国农村充满了苦难，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同理，城市虽然是在新的生产方式确立后兴盛起来的，但城市并不必然代表了进步，城市也面临很多的问题。简言之，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



书名：《中国梦与世界软实力竞争》

作者：赵磊/编著

出版：外文出版社2014年8月

推荐人：贾庆国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全国政协常委

推荐语：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的发展也离不开世界，要实现中国梦，必须得到国际社会的接受与支持。如何选择正确的外交战略对能否顺利实现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对此，要从两方面进行考虑：一是要明确对外战略目标，在维稳和维权的问题上妥善权衡；二是要重申发展是硬道理，处理好短期利益与长期利益的关系，处理好本国利益与他国利益的关系，处理好硬实力与软实力的关系。赵磊教授所主持的研究成果有新意、有亮点，是积极的学术探索，同时对完善中国外交政策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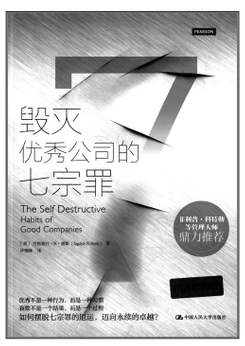


书名：《毁灭优秀公司的七宗罪》

作者：[美]杰格迪什·N·谢斯/著 仲理峰/译

出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译者谈书：在本书中，谢斯博士对那些曾经辉煌卓越而后来却走向衰败或倒闭的世界级公司的发展历程及其在关键发展时刻的选择和决策，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和探讨。他认为，当公司走向卓越或成功时，会在不知不觉中养成一些坏习惯，一经形成，改变起来难，持续下去不仅会大大阻碍公司的健康发展，甚至告知公司衰败或自我毁灭。他在相应章节中，对7种坏习惯在不同案例公司中的形成过程、表现形式和征兆以及公司对改掉这些习惯所作出的努力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和提炼。



蒲松龄读书

□田 野

大作家蒲松龄读的书有两种：一种是野史杂记之类的书，这种书当时被称为“闲书”；一种是四书五经之类的书，这种书是科举考试的必考科目。这两种书给蒲松龄带来了不一样的收获。

蒲松龄读闲书是在青少年时期。蒲松龄出生于元末明初山东一个没落的中产家庭里。由于家贫，请不起老师，跟着父亲识了不少字的蒲松龄便自己读书。蒲松龄先读家中的藏书。这些藏书多为野史杂记，当然无益于科举考试。不过，蒲松龄还是读得津津有味，有些书甚至能够倒背如流。家中的藏书读完了，蒲松龄便借书来读。凡是能借到的有字的纸片，蒲松龄都爱不释手，读起来如痴如狂。

这些阅读给他带来了丰硕的回报。青少年时期的蒲松龄文采飞扬，写出了一大批优美诗词，被明朝的读书人广为传抄，奉为典范。山东学使施闰章称赞说，阅读蒲松龄的文章，就像是在空中闻香味儿，在夜间观明月，可见蒲松龄的文学才华非同一般。当然，这些阅读也为蒲松龄日后写下《聊斋志异》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可惜的是古时候没有出版社，也没有报纸杂志和网络媒体，蒲松龄的作品换不来版税和稿费，以至于不得不靠教书为生。

蒲松龄读的第二种书是四书五经之类的科举必考之书。读书人的最大愿望是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蒲松龄也不例外。为了追求功名，蒲松龄不得不拿出宝贵的时间来读这些书。不过，让才华横溢的蒲松龄寒心的是：他一生7次参加乡试，全部名落孙山，更不用说参加会试考取举人了。72岁那年，蒲松龄终因给一位权贵写了几首赞美诗，这才破格取得了参加会试的资格，得了一个贡生的功名。只是，这个功名来得也太晚了。由于年龄太大，蒲松龄最终没有入仕。三年后，一代文豪蒲松龄去世，享年75岁。

有人把阅读分成有用的阅读和无用的阅读。有用的阅读是有取向性的阅读，无用的阅读是没有目的的阅读。其实，有用和无用只是相对的。因为，在人生的长河里，有用的阅读往往会变得无用，而无用的阅读在不经意间会为你的生命带来意外的惊喜。譬如，大文学家蒲松龄。

读书方法

“毛泽东研究三部曲”再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王翠娟**）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同志的著作“毛泽东研究三部曲”近期再版发行。“毛泽东研究三部曲”包括《毛泽东与近代中国》《毛泽东与当代中国》《毛泽东与毛泽东后的当代中国》三部著作，共计120万字。这三部著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以毛泽东生平和思想研究为切入点，论述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百年间的思想发展史，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以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成果之间的内在关系。上世纪九十年代，这三部著作在福建人民出版社陆续出版后，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先后获第11届中国图书奖、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优秀奖、“光明杯”优秀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著作评选三等奖等奖项。此次修订再版，突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贯穿全书的主线，补充了作者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一些新思考、新见解。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主任逄先知发来贺信。他说，李君如同志的“毛泽东研究三部曲”是研究毛泽东的一部力作，一部巨著。它既是一部人物评传，又是一部思想史著作、一部理论著作。它为人们了解中国革命胜利和中国发生历史性变化的原因，以及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为什么有那么高的威望，作出了有说服力的解读。全书有两个突出特点和优点：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辩证方法所作的深入的理论分析，有见地，有思考，给人以启发，读起来很有兴味；二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同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密切地结合起来，做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书海泛舟

说说古代图书馆

□刘绍义

有人把书院与图书馆混为一谈。尽管古代的书院，比如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河南商丘的应天书院、湖南衡阳石鼓山的石鼓书院、河南登封太室山的嵩阳书院等，也有不少藏书，但它们与图书馆还不是一回事，图书馆是以藏书并供人借阅为主，这些书院是以讲学为主，其目的和设置都相去甚远。

早在周代，我国就有图书馆出现了，不过，那时不叫图书馆，叫“盟府”，主要保存盟约、图籍、档案等与皇室有关的资料。严格地说，这只是图书馆的雏形。老子可以称得上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图书馆馆长，因为据《史记》记载，老子“姓李氏，名耳，字伯阳，谥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这个“守藏室”，就是藏书之所，“史”，就是专门管理图书的官职。

到了西汉，皇室就开始大量收藏图书了，开国之相萧何还在宫内设置了专门用来藏书的石渠阁、天禄阁，这也是后来人们常常把皇家图书馆称为“石渠”“天禄”的原因。汉武帝算得上一位重视保存典籍的开明之君，他不但在宫内修建了专门收藏图书的“秘府”馆舍，还以官方命令在全国广泛征集图书，可谓是对秦朝以来“焚书”的拯救了。

兰台、石室、麒麟阁，都是汉代收藏书籍或资料的地方。从“石室”的名称上，我们就可以知道，当时人们为了防火防潮，已经开始把藏书之所，修建成石头的了。汉代收藏图书的书柜，多为铜色包边，所以也有人把图书馆称之为“金匮”。

东汉桓帝时设置的秘书监一职，就是专门管理图书秘籍的官员。《唐六典·职官》中，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至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书监，属太常，掌禁中图书秘记，故曰秘书”。秘书监就相当于现在的国家图书馆馆长，当时的俸禄是六百石米。这一官职被后代沿用，到了隋炀帝的时候，秘书监已经是正三品了。唐代的魏征就曾经担任过秘书监一职，他为唐代的书籍整理，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到了明代，秘书监一职被废止了，图书馆馆长的职务也并入了翰林院。清代除了文渊阁、文津阁、文澜阁这些图书馆外，还在翰林院、国子监、内府等机构也收藏过图书，这些机构的长官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负责管理这些图书，算得上是兼职的图书馆馆长了。

需要说明的是，唐代以前，图书主要是由官府掌握，民间是不允许大量藏书的。有的朝代，比如秦朝，就曾经采取过“焚书坑儒”的手段，来取缔私人藏书。唐代民间私人图书馆的出现，开了我国历史上私人藏书的先河。

唐代的私人藏书，是随着印刷业的发展而兴旺起来的。想想看也是，在那些逐本抄书的年代，私人要想收藏大量的书籍，除了政治因素外，经济情况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有了先进的印刷技术，官府藏书大量增加，私人藏书也如雨后春笋，茁壮成长。韩愈就曾经在自己的诗歌里，这样描写过老朋友邺侯的藏书：“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由此可知唐代私人藏书之丰之盛了。唐代末年，眉州的孙家书楼，藏书量在四川首屈一指；明朝范钦的天一阁，也是享誉古今，天下闻名的“图书馆”。

无论是私人藏书还是皇家藏书，真正使用“图书馆”一词，还是从“江南图书馆”开始的。修建于清代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的江南图书馆，不但最先使用“图书馆”三个字，也是第一个把藏书推到了公众面前的图书馆。所以说，“江南图书馆”是开创了我国“图书馆”新篇章的图书馆，是一所真正的大众图书馆。